

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逻辑

孙继瞳,王庆忠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中华文化主体性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密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的建构逻辑,需要在逻辑肇始之维,明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主体“在场”形态,奠定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前提;需要在逻辑证成之维,厘清“两个结合”的真切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融合、内容契合中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思路;需要在逻辑承转之维,体悟中华文化从过去经现在而通抵未来的发展记忆及基因特质,探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路径;需要在逻辑拓新之维,秉持“文化间性”理念,开创文明交流互鉴空间,在坚定文化“我者”和文化“他者”中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

关键词:中华文化主体性;新时代;文明;建构

中图分类号:G122;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5-0014-07

在新时代,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也迈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创造性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时代命题,他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8}。现代社会中任何文化形态的展开、丰富与拓新都离不开其主体性特质的相互迸发和突出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推进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精神支撑,它在新时代的建构呈现出逻辑缜密、环环相扣、前后贯通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1]8-9}。因此,若要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逻辑置于系统视域下进行结构化审视,则需要明晰、梳理其前提、思

路、路径与视野,搭建出肇始、证成、承转与拓新的逻辑体系。

一、逻辑肇始:主体“在场”揭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前提

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主体的引领、推动与创造,主体“在场”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生成的逻辑前提。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剖析了“主体”这一概念,将“主体”视为“现实的个人”^{[2]146},并要求在历史性、社会性的具体内涵中把握其本质。进言之,文化主体性中“主体”的表现形式就是“现实的人”通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创造出对象性的存在,以此满足当前人精神需要的活动。由此从学理上看,主体“在场”之于文化主体性的意义当属从能动性的方面来体现,这种“能动与受动”的相互关系将主体“在场”视作文化主体性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承担者。若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场域内展开,主体“在场”的具体形态即是对中华文化一致认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全体中国人民,亦可将其分为引领者与创造者两种基本类型。

收稿日期:2024-07-13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与弘扬对策研究”(21CKSJ10)

作者简介:孙继瞳(1998-),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庆忠(1982-),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 sunjitong2022@163.com

1. 中国共产党作为引领者的“在场”形态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222}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者,同样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当代建构、在未来拓新的坚定引领者、强大组织者。毛泽东曾言道,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了”^{[4]698}。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领导主体,对其展现出鲜明的一元领导权,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表现出规范、科学的固有属性。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无产阶级诞生之前,中华文化往往被少数精英所占据,他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5]39}。但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才有了坚强的领导主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化建设的伟大历史征程,领导人民先后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具体的文明形态。从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群众的文化”^{[4]706},到邓小平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新时期文化建设,再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11}。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文化主体性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例如提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建设,以及系统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等,并将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纳入“七个着力”的方法论体系之中,不断强化、巩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引领者的“在场”形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领导权问题是关乎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规制和引领,持续发挥着新时代举旗定向的作用,是这一创新性工程得以顺利行进的逻辑起点。

2. 中国人民作为创造者的“在场”形态

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呈现出中国人民主

体性的“在场”形态。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视域,因为文化赋予了主体性以“人”的维度,所以文化主体性体现出“人”在认识文化、创造文化过程中的身份确证,也就是人民成为了文化创造、文化发展的实践主体,表现出与对象性客体相呼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换言之,“‘人’本身作为桥梁勾连了文化与主体性,在此意义上,文化主体性就是指人作为文化存在的主体呈现”^[6]。就其现实性而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社会生活共同体中已然达成了相对规范性、合理性的自我确证,并作为维系社会、民族与国家共同体存续、发展的精神纽带而长期存在。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并非机械式地堆砌文化传统,而是依靠置身于社会共同体中的中国人民对历史文化传统除旧布新,积极创造现实、主动挖掘价值的活动。纵观历史,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数千年的绵延发展中渐次塑成,并在历史演进中愈发巩固,人民群众发挥了历史性的创造作用。一方面,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动力之来源于人民,“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3]17}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而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人民对其精神财富的创造是进一步巩固与深化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与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和应然之义。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立论基础在于人民,中华民族接续千年创造出辉煌的中华文明,由此形塑、汇聚起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最终仍要落于人民之处,置于人民群众所需满足的精神世界中。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道,“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7]322}。因此,中国人民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活创造者和意义建构者,而依靠人民之力,创造“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中华文化始终是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逻辑基点及价值追求。

二、逻辑证成：“两个结合”明确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思路

“两个结合”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建构提供了根本思路,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曾言道,“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8]。对“两个结合”何以可能的逻辑证成过程,就是明确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思路的过程。“两个结合”是一体两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体”,是“两个结合”的基础;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面”,揭示了“两个结合”的基本维度。进言之,“第一个结合”的逻辑事实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立论基础,指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视域融合,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魂脉。“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逻辑细化及内容拓展,化解了历史赓续和时代创造的文化矛盾,筑牢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因根脉。

1. “第一个结合”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魂脉

只有明确和坚持“第一个结合”的真切内涵,才能不断彰显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本质,从而牢牢把握住“第二个结合”对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思维方法,真正推进其实践工作。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猛烈批判旧社会、展望新社会的基础上创立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9]⁶⁵。回望近代之初,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关键期,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解放、文明复兴的新希望。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一扫思想上的迷茫与委顿,中国人从此“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0]¹⁵¹⁶。无法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等人在立足西方实际、分析西方问题的基础上创立的,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文化有着时空、立场和方法上的显著差异,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11]¹⁹。毛泽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先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为“第一个结合”提供了视域融合的可能性。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照现实、融合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一理论创新的最终成果深刻昭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逻辑与“第一个结合”之间存在着相互证成的关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11]⁹。唯有扎根中国具体实际的现实根基,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魂脉,才能在“第一个结合”中启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建构思路。

2. “第二个结合”筑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因根脉

“第二个结合”之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于其“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属性,它“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1]⁸。“第二个结合”是先进理论与文明形态的结合,是在历时态思维视域下对同属精神属性的两种样态的有机融合。异质性文化的碰撞,往往会带来转化的可能性,孕育出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融合的视域基础,也存在汇通的内容契合性”^[12]。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精神相互贯通,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理念互相一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为全人类求解放的无产阶级使命彼此适配……“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中,使之释放出足以延续文化生命和促进文明转型的文化光彩。因此可以说,“‘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1]⁶。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并不是“硬凑”,也不是“拼盘”,而是在本质内容上的相互转化、相互成就。在这一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是一个时代新命题,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建构提出了根本思路。以“第二个结合”建构并巩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就是要用“魂脉”激活“根脉”,在澄清文脉本源中塑造具有非常典型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生命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路中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打开广阔空间,在二者

的有机衔接中增强文化叙事能力,占据叙事道义高峰。

三、逻辑承转:文化“两创”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路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是对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逻辑承转与延伸。这条愈发明晰的建构路径并不是对文化传统的消极刻板地侵占,而是对其正向内容与现代价值的拓展和弘扬,以及对美好精神生活与建构未来理想的探索与追求。文化“两创”有其突出的精神内核:创造性转化,即基于时代特点和要求,对具有借鉴价值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创造性改造,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即基于现代的文化气象和精神格局,使历史文化传统内里的精神文明呈现其应有的价值憧憬和历史记忆,促使其在内容上的重释、重构与重塑。文化“两创”分别从形式结构与内容要素两方面探索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路径,是立足现实主义精神与展现浪漫主义色彩的相互融通,是把握“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未来”的前后贯通。

1. 在“传统与现代”的贯通中创造性转化文化主体性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在于历史文化传统,对这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就意味着需要找到内生于传统本身而又具有现代化转型的科学路径。中华文明从过去经现在而通抵未来,具有上下五千多年的辉煌历史,形成了难以磨灭的发展记忆和形态独特的基因特质,对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认知,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第一重内涵。历史文化传统对人具有肯定和否定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历史文化传统作为相对稳定的文化形态,在漫长的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融入了人们的智慧和经验,既稳固了社会生活结构和族群内部的价值,又着力改造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历史文化传统作为厚重、固化的精神基因,当其不再反映人们当下的精神诉求和价值追求,甚至与物质生活实践背道而驰时,就会展现出它的压抑性、落后性。因此,廓清中华文脉赓续传承的演进理路,以此回答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是建构中

华文化主体性首先要厘清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9},由此揭示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根基之上的,是将这多种文化形态贯通起来的文化谱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而言是前置性、本源性的条件,革命文化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展与升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既延续传统却又不拘泥陈规,呈现出中华文化的文化“消化力”和“融摄力”。“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要用‘中华文化’这一概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贯通起来”^[13]。由“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就是使历经沉淀的历史传统重新活络起来的过程,是使逐渐远离现实生活的历史传统不断贴近我们的过程,是真正使中华文化主体性“通古今而计之”的过程。因此,把握“传统与现代”的逻辑承转,以既有的历史传统文化作为参照,通过还原、定位、研判,重思并发展其科学内核,坚持对它内在特质的持续反思、转型和超越,以此丰富充裕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生机。

2. 在“现实与未来”的契合中创新性发展文化主体性

作为物质生活实践的一种精神样态和文化表征,中华文化主体性必然表现为渐进、发展的态势,以其现实性而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新性发展统合了现实维度和未来观照的双重性,达成了文化时代性和文化先进性的辩证统一。其一,建构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当前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逻辑使然。在厘清物质层面或硬实力层面的发展思路后,迫切需要廓清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各种偏激、保守的错误认识和实践。其中,中国式现代化为建构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最为明确的道路依附。具体来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追求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建构提供了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需要先进文化作为思想支撑;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同样遇到了现代转型、内容赋能的契机。其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建构是孕育文明发展新机、开辟文明前进道路的逻辑必然。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未雨绸缪的远虑、前瞻特质,它在通古今之变中呈现出明晰的未来发展理路,并根深蒂固般存在于每位中国人民的价值伦理及思维深处,在中国人民代代的赓续传承中,汇聚成一个统一的历史发展趋向。通过平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参照和未来观照,在形成“对中华文化深刻的‘自知之明’”^[14]的基础上,续写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举措。

若将民族复兴寄托于历史传统的再现,而不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勃兴,那么复兴之题就无从谈起。因此,要“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摒弃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7]323-324}。一方面,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现实观照,就是要求正确看待当今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正确看待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需依靠的文化血脉,深刻认识新时代要肩负起的文化使命,建设“在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维度内独具现代气质的中华文明有机体”^[15]。另一方面,创新性发展文化主体性的未来指向,就是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相互证成的关系,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资源、思想旨趣和价值旨归,赋能中华文化以创新势能、发展动能,促使其在科学回答“时代之问”中返本开新,创“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11]。在“现实与未来”的融通中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两创”的创造性应用,彰显出中国人民的文化根脉意识和文化反思精神。

四、逻辑拓新：“文化间性”开阔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视野

“文化间性”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延展理念,是以文化交往为主要方式,旨在弥合文化“我者”与“他者”二元对立的交流困境,从而达成一种

开放、包容、平等的积极关系。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新时代建构的宏阔视野就体现在其鲜明的“文化间性”中。从学理上讲,真正的中华文化主体性绝不是与其他文化客体相互对立的抽象集合,而是在与文化“他者”的现实交往中迈向彼此证成、相互契合关系的文化概念。在此意义上,中华文化坚决摒弃文化独断论,不做妄自尊大的“自我欣赏者”,坚定走文明互鉴之路,在平等互融、比较鉴别中拓展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阐释空间。开阔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视野凸显出进行现代文明交流中的自主意识,以及担负文化使命的自觉责任。具言之,就发生逻辑而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中华文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同行同构,在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中坚守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发展逻辑而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空间拓展与世界文明发展同向同行,在破解文明“中西之争”难题基础之上形塑了一种“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6]。

1. 坚定文化“我者”,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

独立性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鲜明特质。中华文化若没有内在的自主定力,而是一味地“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那么就不可能生成中华文化主体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日益复杂的当下,依附性现代化难题仍然广泛体现在现代化后发国家之中,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些国家“缺少精神独立自主的勇气和智慧”^[16]。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其辉煌的现实成就表明中国自身并没有陷入至依附性困境中,而是在始终保持精神独立的前提下形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精神独立自主是基于自身文化禀赋而展现出的自觉、自主意识,是在文化“一”与“多”的关系交汇中生成的,是中华民族在检视历史、观照现实、展望未来的贯通中,形成的系统性、理论性的深层文化认知,包含着对中华文化历史传统的反思与改进。中华文明是一种“‘复数’多元文明”^[17],它在保证文化主干的前提下,尊重各民族、各地域的文化个性,对内部多元文化敢于接纳、吸收、扬弃。由此而形成的中华文明,自其塑成之日起就被各民族群体广泛认同、体认、维护,成为了他们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以这种共同基因、共有记忆汇聚而成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不断延续、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依靠。因此

可以说,文化的命运就是民族的命运,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精神内核相融合的文明结晶,其主体性深刻关乎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坚守这样一种“‘我之为我’的标识系统”^[18],应当在明确自身本土化定位的前提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审思“西化”“复古”的文化观念,既不厚古薄今、颂古非今,又不妄自菲薄、夜郎自大,做到捍守中华文化血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2. 融通文化“他者”,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建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之路与世界文明发展之路交汇而必然呈现的时代论题,它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延伸式解读,以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建构,无不渗透着“文化间性”的特征,也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以其开放包容的原则,构筑了一种多元性、多样性、互动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公共话语空间。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宏阔语境中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进行事实确证,在于秉持“文化间性”的建构理念,以对“现实的人”的“类”本质进行平等看待,进而,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路途中构建一种“利益共促、话语共建、意义共融、价值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空间”^[19],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同频共振的发展图景。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中,这一境况的现实表现有着既解构又建构的两重意义: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各国现代社会的形态转型、结构重组、关系变革,使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共处于同一环境、条件下生长,使差异文化的和谐共存、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全球化以其本质来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化的“一元化”及抽象的“同质化”,使落后国家的文化理念与形态受制于先进国家的发展逻辑,最终会导致自身文化特性的消失。因此,如何尊重分殊与差异,如何接纳多元与“他者”,是新时代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所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20]469-470}。正确看待“他者”文化,就应当坚决摒弃因循守旧的本质主

义倾向和碎片化的解构主义倾向,既要从中化文化的宝库中汲取“和衷共济”的思想精髓,保持“和而不同”的交往方式,做到有所止、把握度,又要坚持以世界眼光关注全人类前途命运,将着眼点放在关注中国发展前途、世界发展大势、人类发展潮流上,博纳广融、兼收并蓄,“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迈向更加美好的文明形态”^[21]。

五、结 语

新时代加强文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要以建构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基本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逻辑。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引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主体力量和依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本思路和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明确路径和方针;秉持“文化间性”,坚定文明交流互鉴是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由之路。文化兴则民族兴,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逻辑,在文化自我追寻、自我成就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邹广文. 回归自己民族的文化主体性[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4(3):23-31.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8]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 求是,2023(20).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2] 刘同舫. “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1): 4-10.
- [13] 陈方刘. “两个结合”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7): 26-32.
- [14] 田鹏颖. 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叙事逻辑[J]. 学术交流, 2024(2): 5-15.
- [15] 洪向华,解超.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蕴义、实践要义与发展旨义[J]. 东岳论丛, 2024(3): 5-13,191.
- [16] 田旭明. 精神独立自主:思想内涵、生成逻辑与实践要求[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6):57-64.
- [17] 韩庆祥. 从三维逻辑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J]. 教学与研究, 2023(10): 9-12.
- [18] 李明.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深度解读[J]. 理论月刊, 2020(2): 42-52.
- [19] 韩升.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呈现[J]. 中州学刊, 2024(3):5-12.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1] 靳呈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意蕴[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4(3): 29-34.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New Era

SUN Ji-tong, WANG Qing-zho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because it provides a strong spiritu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al force. To grasp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presence” form of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s the subjec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ogic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the dimension of logic proof, it is necessary to elucidate the true connotation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and the basic idea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based on the fusion of horizons and the compatibility of content when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dimension of logical trans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evolving memory and genetic traits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and into the future, and to explore the path of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dimension of logical innov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the “intercultural” concept by creating a space for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form a “new cultur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ultural “I” and the cultural “others”.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New Era;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编辑 王思齐】